

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一卷

● 顧頡剛 著

寄居錄

瓊東雜記

侍養錄

景西雜記

纂史隨筆

顧頡剛／著

第一卷

頡剛讀書筆記

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一卷

79. 01. 1077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 O. C.

定價：全套十卷新台幣6000元

著 者 顧 頡 剛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 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241-3 (套)

・ 89013-01 ・



● 顧頡剛先生61歲攝於上海。

余讀書最要附會又是光胸在而見作吠聲一犬而
 古今才氣犯此北鮮每拂然有不冰議焉自見于同
 輩或將謂我為狂故推此冊歸焉今有宏願在
 他日讀書通博不著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揭破一
 彼年過形在哉為學術者新人心世道一務班固告
 傳毅曰下筆不能自休者每一章終不似而後出之
 斯則甚為難也其有讀書所得或即證可求紙在小
 品亦登于斯民國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頤剛記

• 此為顧頤剛先生一九一
 四年正式所立讀書筆記
 的第一冊——《寒假讀
 書記》的序言，確立了
 他一生讀書的宗旨。

前言

父親顧頤剛先生一生治學，勤於作讀書筆記；從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起，至一九八〇年（民國六十九年）逝世，一直沒有間斷過，六十多年來積累了近二百冊筆記，共三、四百萬言。父親一方面用它搜集材料、思考問題，作為撰寫論文之基礎，一方面繼續錄下新發現的材料和新見解，補充以往論文的不足，甚至改變某些觀點，不斷深化自己的研究。他曾談到論文和筆記的區別及聯繫：

「論文篇幅長，易生蕪累」，「筆記者，或長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簡潔之美。其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記錄人言，其態度可以嚴肅，亦可以詼諧，隨意揮灑，有如行雲流水，一任天機。此學術界之小品文也」，「為筆記既多，以之匯入論文，則論文充實矣，作文既多，以之灌於著作，則著作不朽矣」。（《浪口村隨筆》油印本〈序〉）他的讀書筆記已成為他

全部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父親自幼讀書喜歡獨立思考，常把自己的主張批在書上，「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裡」。(《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下稱〈自序〉)。「每從父、祖案頭獲見《困學紀聞》、《日知錄》諸書，愛其時出新義，勝於舊注；謬欲效顰，立冊以備發揮」。(《史林雜識·小引》，下稱〈小引〉)早年常備有兩種筆記簿：一種便于攜帶的「袖珍筆記冊」，專門鈔撮見聞或偶然會悟的見解，有時則以紙片代替；另一種是正式的「紅格筆記簿」，即印有紅格的毛邊紙線裝簿冊，作為最後騰清的筆記簿。這種記錄方式保持到以後。抗日戰爭前的一部分筆記，即因人事冗雜，不暇檢冊子，率書單頁紙上，置于木盒中，七七事變突起，他因宣傳抗日受到通緝，匆遽離京，此盒遂不知去向，父親每念及此，輒歎惜不已。

起初筆記內容不拘一格，幼年有一段時期看戲成了癖好，作過《論劇記》，「居然有始有終地寫了好幾冊。後來讀書方面的興致漸漸超過了看戲的興致了，又在《論劇記》外立《讀書記》」。(〈自序〉)現存兩冊一九一三年所記《檀痕日載》，大約就是《論劇記》的一部分。另存一九二〇年所記《游觀雜記》一冊，專記游覽北京西山及雍和宮。前面提到的《讀書記》，為一九一

四年正式所立的讀書筆記。在其第一冊——《寒假讀書記》首頁上寫道：

余讀書最惡附會，又最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于同輩，或將謂我為狂。……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打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術書籍人心世道之多。

這段文字被引入《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它概括了父親一生讀書的宗旨。

父親早期的讀書筆記沒有什麼中心，至一九二三年，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始專力治古史，筆記內容逐漸成為有系統有目的性了。對於起初幾年的筆記，他自己評價說：

到現在翻開看時，不由得不一陣陣地流汗，因為裡邊幾乎滿幅是空語，全沒有自己學問上的建設。但一冊一冊地翻下去時，空虛的漸漸變成實實了，散亂的也漸漸理出系統來了，又漸漸傾向到專門的建設的方面了，這便使我把慚愧之情輕減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學問是必須一天一天地實做的，空虛和荒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個階級；惟其肯在空虛和荒謬之後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方有充實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現在所承認為滿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過了十年再看也還是一樣的羞慚流汗。所以我對於我的筆記簿始終看作千金的敝帚。（〈自序〉）

他堅信學問是一點一滴積累而成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無頓悟的奇蹟，因此立志用全力在細磨功夫上，摒絕僥倖取巧之心。後來他總結自己的治學得益於筆記說：

所以尚能從事於考索之業者，只緣個人習性樂於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厭煩，一登於冊，隨手可稽，予蓋以鈔寫代其記憶者也。（〈小引〉）

可見作讀書筆記正是父親治學的重要方法和鮮明特點。

(二)

父親曾多次說到，他一生治學目標，就是「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縱觀全部筆記，其內容都與這一主題緊密相關。

父親認為，研究歷史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為探究古史真面目，他對《尚書》、《詩經》、《史記》及《左傳》、《論語》、《孟子》、《墨子》等書用力最勤。

筆記中長期注意蒐集有關《尚書》的性質、名稱、篇目、亡佚情況、傳本、語言文法、歷代研究等方面的材料。除直接材料外，還摘錄了許多用以比較研究的間接材料。三十年代初，在燕京大學編《尚書研究講義》，著力於《堯典》，作了大量札記，以證明它始作於戰國，修訂於漢武之世；五十年代初，在上海誠明文學院教授《尚書》研究課，正值史學界討論西周社會性質問題，他決心將《尚書》徹底翻譯出來，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中的一個課題供給確實可靠的材料，故對《周書》諸篇的道德觀念、等級制度、語言文字等方面頗下工夫。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將

「《尚書》今譯」納入出版計畫，為超過三十年前譯《盤庚》的水平，特立《讀尚書筆記》，從多方面潛心探研，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共成七冊。

父親早在二十年代就發表過研究《詩經》的文章，稱它「可以算作中國所有的書籍中最有價值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以後仍不斷探討和極力恢復其古代樂歌的本來面目，筆記從《宋書·樂志》、《樂府詩集》、《古詩十九首》等書中摘錄了不少樂歌，還搜集了古今樂曲和戲曲的演奏與唱法，進行對比，尋找周人樂詩在起興、和聲、重疊、尾聲等方面的規律，以及徒歌與樂歌的關係。五十年代為整理出版姚際恆《詩經通論》，亦作了大量札記。

父親在三十年代標點過《史記》。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又應中華書局之邀標點《史記》，更將其精讀一遍，就《史記》的來源、體例、傳本、舊注、後人增改和評價、司馬遷行年以及如何進行現代標點等問題廣蒐博徵，留下不少精闢的議論。

父親始終重視周秦諸子及《左傳》、《大戴禮》、《國語》等典籍中的古史傳說，並認真辨析諸說異同、之間的聯繫和演變的原因，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作具體的論證。筆記所輯有關黃帝、少昊、唐堯、虞舜等古帝的材料尤多。如對於少昊氏，他早年集材，重在論證少昊金天氏是王莽劉歆之徒為改朝換代的需要硬插進古帝王系統的；後期深入研究《尚書》中的鳥夷族，集材說明少昊為東方民族鳥夷的宗神，亦是其崇拜的鳳鳥圖騰。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同，研究的方法和材料都有新的突破。

父親從小喜歡看戲，受到戲劇故事變化的啟發，很早就有志於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為系統的敘述。除有關京、崑及各種地方劇種藝術形式的札記外，筆記中更多地記錄了各種戲曲故事，以及不少中外神話傳說，從中尋找故事變化的背景及規律。他對民間的鬼神信仰、婚喪巫術等風俗十分重視，冀圖以此說明古史傳說的形成、揭示古代社會的真面目，同時也為戲曲發展史、民俗學等研究聚集了豐富的資料。

古地理與古民族的札記，是筆記的又一重要方面。如果說，關於古代疆域觀念，古代州制，華夏民族的形成與古代蠻夷戎狄的關係等方面的材料較多地體現在一些重要論文中，那麼，對於傳說時代的地理、古代郡縣、都邑及古民族的札記，則反映了父親不斷深入的思索和研究。一九五三年，上海地圖出版社委託他與童丹楓先生合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九五七年與侯仁之、譚其驤等先生一起編輯《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這期間集中考慮了有關傳說中堯、舜、禹的生卒地及活動區域、夏商周三代都邑及疆域的問題。

例如夏代疆域，他認為其中心應在河南南部，而後擴大至山西。又從西北多「大夏」之名推斷夏代的西境以及夏亡之後夏人活動區域西移的踪迹。

對鳥夷族活動區域及遷徙分化情況，是父親後期著力研究的課題。他將古文獻、古文字和民族學的材料融會貫通，說明其為古代中國一大民族，曾佔有沿海一帶，跨八禹貢之揚、豫、青、徐諸州，延及冀州者則為夫餘；風、偃、羸、鳩等姓皆其分支；唐、虞、商之為東夷，亦即鳥夷；

周公東征之攸國亦為鳥夷之一。

這部分札記的內容，在文獻範圍之外更有實地考察的心得。抗日戰爭時巡遊甘肅、青海，以臨夏小積石山證之「禹貢」，「導河積石」必為此山而非今青海之積石山；六十年代初歇夏呼倫貝爾，三至草地，以牛群的蓄養情況證之《詩經》「騶牝三千」為古人大量蓄養牝牛馬。他曾說：考據之業，搜集書籍證據，以多為勝，此清人之成法也。……予性好遠游，從實生活中發見可以糾正前人成說者不少，于是超出都市而入農村，超出中原而至邊疆，以今證古，足以破舊而立新，較之清人舊業自為進步。（《湯山小記》三《序》一九五七年六月）這是對自己研究方法的公正評價。

「名物制度」為傳統經學的一個重要方面，父親以新的觀點和方法，留下許多精彩的議論。他主張以淺近民族之禮來研究中國古禮的產生及其內容，對古代宗法、祭祀、田賦、兵刑、官爵等制度給予新的解釋。

他將「曲禮」之天官系統與《周禮》官制進行對比，搜集中外古代巫祝之地位由尊而賤的材料，證明「曲禮」以天事為先，人事為後之說，必非作者之想象，視《周官》、「洪範」更符合于古代之實際。

他注意搜集姓氏稱謂方面的材料，尋找姬、姜、姒、己、姚、媯、嬴諸姓間的關係，以探究古代民族的來龍去脈。

父親青年時期曾編輯《清代著述考》，尚未作完，筆記中還在繼續蒐集材料。自從以全力從事考辨古史之業後，更以疑古辨偽為中心，闡述經學的大勢與今日的任務，輯錄歷代學人及其著述情況，以便對經學作一總的清理。筆記中還保存了不少他對古籍整理的設想和意見、各個時期的工作計畫以及古史研究課題；保存了一些因戰亂或政治運動而損失掉的往來論學書札，它們是古史研究及近代學術史的寶貴資料。

由於父親出生于江蘇蘇州，故筆記貫穿了吳中史蹟、地理、文藝、風俗、人物、史志諸方面的內容，形成讀書筆記的獨特風格。

(三)

父親一生追求專心讀書治學的生活，時常為自己多讀書、多作筆記而欣喜，也為忙於人事應酬或因戰亂干擾荒疏了筆記而惋惜。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八、九年裡，在燕京大學任教。三〇年，他銳于思辨，急欲立一系統，故有《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一長文發表，當時所記，皆就想到的問題勿遽間寫數行，使無遺忘而已。次年全力研究《堯典》，連帶研究漢史及《詩經》；而欲採禪讓制則必先及世官制，故對《左傳》資料亦多擷取。那時的筆記，最短兩三天即寫滿一冊，學問可謂勇猛精進。

抗戰中輾轉於西北、西南，無法再作系統的研究，筆記多有間斷，或一兩年才寫畢一冊。那段時期不少冊的序文中都流露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怨憤之情。

一九四八年底，至上海大中國圖書局任編輯工作，結束了一時期內教課、交際的忙亂生活，按日讀書寫作，心有所得，又作札記。

五十年代初任職較多，又歷各種政治運動，讀書時間有限。五三年元旦，因養病得覽書，時有新得，癒後一一寫入筆記，一月之中竟得兩冊，使他驚歎：「此予三十年前之生活也！」（《法華讀書記》八〇序）一九五三年三月）

一九六四年一月，攜書稿於北京醫院病房中作記。醫生護士每加勸阻，老友王伯祥先生亦移書相勸。為此他說：「良友之言，安敢不受。特予讀書已成痼癖，非此不愉，而筆記則猶行雲、流水，隨筆書寫，異於為文之集中精神。苟並此而不為，我之為人將如行尸走肉者幾希矣。」（《愚脩錄》九〇序）一九六四年十月）筆記之於父親，如空氣陽光之于生命，須臾不能相離。

父親珍愛自己的筆記，精心為之命名。其中多以彼時所居之地名者，如《瓊東》、《景西》兩雜記，即因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學工作時寓所處景山北海間而得名；《郊居雜記》得名於三十年代生活的海淀燕京大學；抗戰期間曾遷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因有《浪口村隨筆》；五十年代初寓於滬西武康路，地近法華鎮，故成《法華讀書記》；五七年養病於京北小湯山，因有《湯山小記》。亦有以彼時主要研究內容命名者，自一九五四年秋起，在北海畫舫齋得性軒內標點《資治

通鑑》，故成《得性軒讀鑑記》；前文提到的《讀尚書筆記》亦屬此類。更有以彼時心境命名者，一九二四年初立《泣顓循軌室筆記》，三十多年後回憶道：

余自知治學，即欲按計畫讀書，不幸五四運動後新刊物大出，而余略能文，遂為編輯人組稿目標；刊物既頻見余名，社會對於余之要求遂日切，而余乃無日不在茶酒宴會之中。此非玉成余，實毀裂余也。因自標居室為「泣顓循軌」，謂己之生活太無軌道，泣而顓之循，所以祈人之見舍也。……題此一名，亦唯以自警而已。（《泣顓循軌室筆記》一〈序〉）

一九五四年自滬遷京後，思業務繁重，而年已過六旬，遂立《緩齋雜記》道：

念十餘年前，識貪多務得為不寐病之根源，求精神之弛放，曾自署曰緩齋，遠師西門豹佩韋之誼，爰仍拈此字以名寓中書室焉。（《緩齋雜記》一〈序〉一九五五年八月）

七十歲時，援《淮南·脩物》語「夫學亦人之砥錫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立冊道：

淮南王諱『長』曰『脩』。予自念所短長，則口說為短，筆書為長。知其長而善用之，則秉質雖愚，亦可藉勤學而與知者較一日之勝負矣。因題其端曰《愚脩錄》。（《愚脩錄》一〈序〉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為了振奮垂暮之年的進取之心，又立《高春瑣語》，取高誘注《淮南·天文》之「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語：「惟日之就暮，猶不廢勞動，以適應治生之所需，此則余汲汲顧影而不欲自棄

之心情也。」（《高春瑣語》一八序）一九六六年六月）足見其以讀書筆記督促自己用功的良苦用心。父親隨手作記，亦不無規律可循，他常常將篇幅長者書於前，其短者列於後。因此一冊筆記往往前面是各種古史問題的較為系統的札記，後面數頁則是有關戲曲、民俗、掌故等零碎紀錄。有的冊子餘下數頁空白，若干年後又拿來使用，不求內容之連續，但求記滿。所以有些簿冊中的條目（特別是後面數條）記錄的時間不一定全與立冊的時間相符。

（四）

父親從五十多歲以後，就時常考慮筆記的整理工作。他認為筆記的功用，不僅在於個人學問的積累，還是一門學科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他說：

凡是人的知識和心得，總是零碎的。必須把許多人的知識和心得合起來，方可得著全體。筆記者，個人至瑣碎之紀錄也，然以其皆真實不虛，故其用至廣。以小說史言之，有俞樾之《小浮梅閒話》等，於是有魯迅之《小說舊聞鈔》，於是撰小說史者得有基礎之材料。以經學言之，有臧琳之《經義雜記》等，於是有蔡啟盛之《皇清經解檢目》，於是欲綜合歷代經說求出一結論者得有基礎之材料。必有零碎材料於先，進一步加以系統之編排，然後再進一步方可有系統之整理。（《虬江市隱雜記》三）

父親視治學如接力賽，若系統的整理工作及身不能完成，亦可將自己手集之資料交予後輩，成為他們研究之基礎，「一人之力至薄弱，獲他人之助便可擴大至無垠」。（《緩齋雜記》六〈序〉）父親還認為讀書筆記是一種傳統的著述方式。他在後來寫在《法華讀書記》第一冊的〈序〉中說：

……迄今四載，將二十冊矣。雖無可觀，亦少留思想上之陳迹。此譬猶地質學家之檢拳石，考古學家之拾片瓦，自他人觀之盡廢材也，而就撿拾之者言之，則苦心存焉爾，期望存焉爾……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書豈伊自為，亦承夢溪、容齋之緒也。是固我國文體之一種，證據欲豐而辭句欲簡，脫不廢整理古史、古籍之業者，其體實終古而長存。予之書苟能步武亭林，於願足矣。……

可見他將作筆記既當作一種治學方法，又成功一種著述體材。

父親的部分筆記，生前曾經發表。其中未經整理、直接刊登于報刊上的較為集中者有：二、三十年代《小說月報》十四、十五卷的部分期號上及《文學季刊》、《文學》兩創刊號上有關《詩經》、戲曲、詩歌的札記；四十年代中期《文匯報》「史地專刊」所載抗戰期間寫成的地理、風俗等方面的筆記。此外，經整理發表者即《浪口村隨筆》以及由此精心雕琢而成的《史林雜識初編》。抗戰初期父親在甘、青地區接觸蒙藏回等少數民族，以彼地之風尚考證中原古史，隨手作記。

一九三九年為避敵機轟炸，遷居昆明北郊浪口村，頗得閑暇，便將日前聞見證之故籍，寫成《浪口村隨筆》三冊。次年移居成都，求書不難，遂將其潤飾成篇，冠以篇題，分期發表於齊魯大學